

才兼文武，学贯天人

——纪念山东大学数学学科创始人黄际遇先生

东青



上期简介

前文略述了任初先生作为山东大学数学学科的创始人于1930年-1936年间执教山东大学的经历。

先生于1929年12月即赶赴青岛参与当时国立青岛大学的创制，几尽一人之力建立了山东大学数学系。后通过各种渠道及方式，积极筹措资金、延揽人才、编制课程，将山东大学数学系带入了其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鼎盛时期。

任初先生以数学立身，兼治文史，留日时曾师从国学大师章

太炎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深得其赏识，并兼与黄侃等友善。出任山东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后，对于文科学科的建设也非常用心。除发表相关著述外，更承担中文系教学任务。

除文理兼通之外，任初先生还极爱运动，善马术、精击剑、喜足球。平日里一袭长衫，胸前总是缝有两个口袋，传说内置钢笔与飞镖，这也算是先生文武兼资的一个缩影吧。任初先生毕生嗜象棋，即便战乱时期也勤研不辍，其水平在

当时已可居一流棋手之列。

此外，当时的山东大学曾流传有“酒中八仙”的逸闻，先生为其中佼佼者。每当嘉会，先生的笑话最多，荤素俱全，在座的人无不绝倒，甚至于喷饭。酒阑兴发，击箸而歌，声震屋瓦，激昂慷慨，有古燕赵豪士风。一次微醺之后，任初先生口占一联：“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虽纯为戏言，但其豪气可见一斑。然终有宴罢曲终之时，因时局动荡，政治黑暗，“八仙”相聚并未几年便作风流云散。



曾昭安(1892-1978),字斌益,江西吉水人,武汉大学的创立人之一,中国数学会的创建人之一

万里迢递,四海桃李^[1]

带着几多牵挂与些许无奈,任初先生离开山东一路南下,并接受了国立中山大学的聘请,回故籍重执教鞭,这已是任初先生第二次执教中山大学。此前,除受聘于山东大学之外,任初先生曾先后执教过天津高等工业学校(今河北工业大学)、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国立中山大学(今中山大学)、河南中山大学(今河南大学)等高校^[2],教学生涯可谓丰富。尽管民国时期,出于种种原因,教师辗转任教也属平常,但像任初先生这样几乎每到一处皆领衔学科开创性工作的却也并不多见。

1910年,任初先生自日本学成归国后不久即赴天津,任教于天津高等工业学堂。时值清末,此类“西式”学堂兴办未久,不但师资缺乏,合用的教材也不多。任初先生在此期间亲自编写授课讲义并编纂教材,其编写的《中华中学物理教科书》于1914年



经亨颐(1877-1938),字子渊,号石禅,晚号颐渊,浙江上虞人。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书画家

由中华书局出版,全国各地中学多有采用。尽管在天津执教的成果斐然,但任初先生当初实是抱着“打零工”的心态去的,其赴津的主要目的是进京赶考,天津在其构想之中不过是一个权且安身立命的中转站。

相信许多即便只对高中历史课本有印象的读者也会记得,1905年因时局所迫,清政府已经废除了科举制度,那么1910年任初先生进京赶的是什么考呢?答曰:“洋科举”。这是1905年科举制度正式废除后,清政府为吸引归国的海外留学生通过考试进入政府而根据留学生留学时所习科目以及外语专门设置的考试,民间俗称“洋科举”。与传统的科举考试相比,其报考科目可谓丰富,包括“格致科”、“工科”、“商科”乃至“牙科”等。从1906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为止,这种被称为“洋科举”的留学生考试共举办过六次,总共录取了1388人,按照当时的规定,凡在海外高等学校入学三年者皆可应考。考试分为两场,首场在学部举行,称“部试”,考取者按成

绩及所学专业分别授予各科“进士”、“举人”等传统科举的身份,因此也就诞生了诸如“工科进士”、“商科举人”乃至“牙科进士”等一系列“新功名”;次场一般在时隔数月之后的保和殿举行,称为“廷试”,按照考试成绩分出等级,并授予职衔。

1910年10月,任初先生应父命进京应试,获“格致科举人”的功名。所谓“格致科”,类似于今天我们习惯上说的理科。翌年初,先生参加廷试,考取二等,授“七品小京官”的职衔,候补待用。宣统三年五月初九《唐景崇等为请照章录用廷试游学毕业生事奏折》对此有相关记载:

“经言讲官、学务大臣臣唐景崇等跪奏,为遵章预请钦定廷试日期,恭折仰祈圣鉴事。……黄际遇,年二十七岁,广东增生,格致科举人。……以上一百七十六名,廷试二等,前经学部考试列中等,均拟请旨以七品小京官按照所学科目分部补用。”^[3]

尽管任初先生对此“举人”功名及官衔并不在意,但其家乡澄海却甚为重视。此后澄海一地除一二有功名的士绅外,凡提到任初先生,一律呼之为“黄家举人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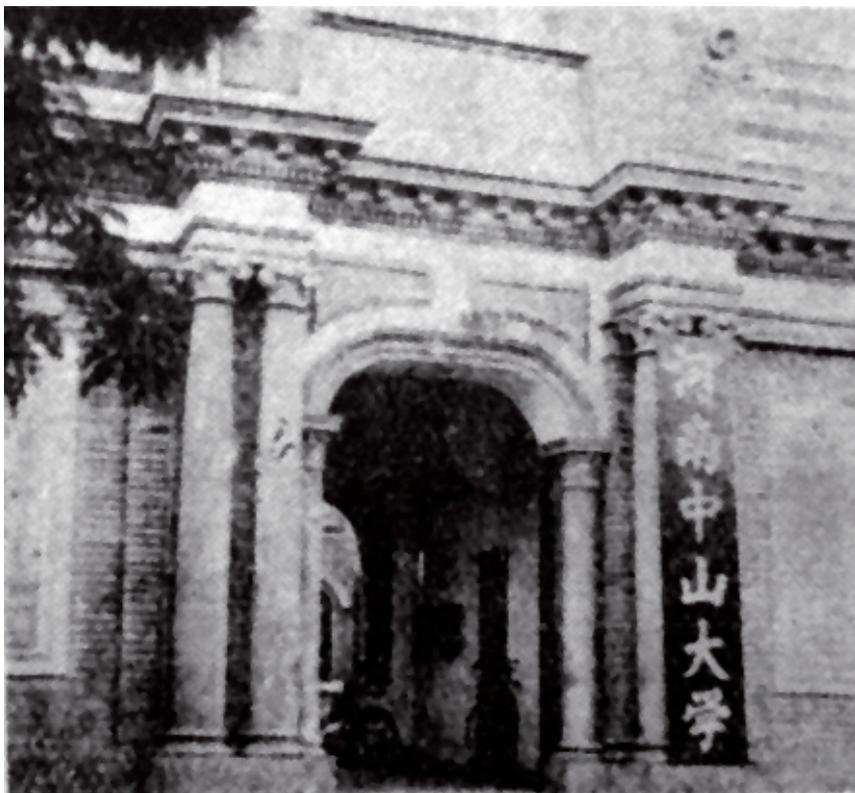
1915年,任初先生应当时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前身)邀请赴武汉执教。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是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政府建立的中国第二所高等师范学校,属于中华民国所设六大学区之一——华中学区的最高学府。其他几所分别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和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之所以将高等师范学校设为各学区的最高学府,与当时中国急需师资的情况不无关系,而师范教育的开始就是大学教育的开始。其后随着中国教育的发展,上述师范学校大多转为了综合性大学,成为各地大学的翘楚。

任初先生在武昌高等师范学堂担

任数理部教授、主任、校教务长等职，并曾一度代理校长。他对当时学生中表现出的积极的求知欲很是欣赏，对时为数理部第一班学员的曾昭安所组织的数学研究会精心培养并大力支持，为其出谋划策，加以组织引导。在任初先生的筹措下，数学研究会在1916年改组为武昌高师数理学会，先生为首任会长，而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学会也成为辛亥革命后，在高等学校中成立最早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数理学术团体。1917年，曾昭安学成毕业，在任初先生支持下先后赴日本、美国留学深造，他在国外的研究成果经任初先生推荐也陆续得以在国内发表。1925年，曾昭安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并接受武汉大学邀请，回到母校担任数学系教授，创建和领导武汉大学数学系数十年。此间他和任初先生一直保持书信往来^[4]，既有学问上的探讨，也有生活上的交流，师生之情笃深可见。

1918年冬，任初先生奉派至江浙一带考察理科教育，此行对任初先生而言无论于公于私都可谓“得偿所愿”。于公，自日本留学归来后，先生一直希望能够总结一套适于本土且行之有效的理科尤其是数学教育方法，在先后执教了天津、武汉两地后，此种想法更为迫切。此次能够赴江浙一带考察，多少可弥补其对南方教育认知的不足，对其数学教学方法的探索很有裨益。于私，任初先生留学日本期间结识的挚友经亨颐先生时为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校长，多年不见，正可一会，且对此行之考察目的也有助益。

经亨颐，字子渊，号石禅，浙江上虞人。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书画家。“五四”运动时期，时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的子渊先生鼓励支持爱国民主斗争，倡导新文化运动，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1921年，子渊先生在位于浙江省上虞市风景优美的白马湖畔创办了“春晖中学”，汇集了夏



1912年，著名教育家林伯襄创办了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成为当时中国的三大留学培训基地之一，这也成为现今河南大学的前身。1922年，冯玉祥主政河南，在此创建中州大学。1927年，以此为基础改建河南中山大学，又名国立第五中山大学（其他四所为中山大学——国立第一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国立第二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国立第四中山大学）

丐尊、朱自清、朱光潜、丰子恺等一批名师硕彦在此执教，推行新教育，传播新文化，以图“一洗从来之积弊”。依美景、延名师、文化深厚、思想新潮，如此学校想不出名也难，因此，春晖中学建校不久即蜚声海内外，时有“北有南开，南有春晖”的美誉。在子渊先生30多年教育工作中，始终坚持“与时俱进”、“适应新潮流”的办学方针，提出并一直努力践行“反对旧势力，建立新学风”的教学主张。这些方针与主张深得任初先生赞赏。

任初先生于12月30日抵达杭州，子渊先生已经在站台恭候多时，连连感叹“故人不见又四年”，好友久别重逢的激动心情溢于言表，这使得任初先生感动不已。此后几天的行程，子

渊先生几乎一直陪伴左右。白天或陪同考察，或登山临水，晚上或探讨学问，或觥筹交错。几乎每晚子渊先生都要送任初先生回旅店再畅聊一番方离去，要不是顾及任初先生休息不好，二人抵足而卧，大被同眠也说得不得了。此次行程，为任初先生1916年春完成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进行实况及成绩说明书》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1919年10月，子渊先生至武汉出差，行程极为紧张——公事完毕后当日即行。任初先生得知后，软硬兼施，又硬留了好友逗留一日。任初先生先雇马车，陪子渊先生游览汉口街衢，并发电报召留日武昌同学七八人，在普海春酒店宴请子渊先生。子渊先生日记记载“同学盛情，余大醉”——

虽仅寥寥七字，足见同学情谊。

1920年12月。任初先生受当时的民国政府教育部委派前往欧美考察教育，同时到芝加哥大学进修，成为著名数学家L. E. Dickson (1874-1954)的学生，并于1922年获得该校的理科硕士学位。^[5]尽管任初先生本人不喜张扬，但据说对此学位也很有些得意，曾手书“硕士第”匾额于澄海自家寓邸门上，以示其书香家风。

回国后不久，任初先生受时任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前身）校长的张鸿烈先生的邀请赴河南执教。张鸿烈也是留美硕士、同盟会员，早年间与任初先生熟知。1924年9月，任初先生正式履新，一手创建了中州大学数理系，并担任系主任、教授，其间辛苦自不待言。在创制之余，任初先生还指导学生宋鸿哲创办了《数学报》。1926年，因时局动荡，任初先生被迫离开中州大学，时值国立广东大学改为国立中山大学，聘请海内外名贤执教，任初先生即被聘为国立中山大学教授。1927年6月，冯玉祥被任命为河南省主席，他重整教育，将河南三所高校（中州大学、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和河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合并为国立第五中山大学。1928年，受冯玉祥将军的再三邀请，任初先生再次赴河南执教，出任河南中山大学校务主任、数学教授。后来时任河南中山大学校长的查良钊（字勉仲，1897-1982。顺便说一句，查良钊先生与我们都熟悉的现代武侠小说大家金庸先生，即查良镛，和近代诗人穆旦先生，即查良铮，是同族兄弟）致函国立中山大学，恳请慨允任初先生执教河南，对此，当时的《国立中山大学日报》有记载曰：

“黄任初先生日前请假北行，原有销假南旋之意，昨由河南中山大学查良钊校长来函，略谓，黄君现在伊校任教务主任兼数学教授，学子倾心，同人敬爱，一时万难听其回粤，希为



黄际遇先生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著名数学家L. E. Dickson教授（1874-1954）

慨允，另聘专才等语。本校祇以‘勉副雅怀，谨从台命，他时有缘可假，仍希再赐教益’为词，函复查校长云。”^[6]（《黄任初教授未克南来》）

由此可见，当时各校求贤若渴，亦可见任初先生端的是魅力不可挡。这样，任初先生即从“1929年5月出任河南中山大学校长。时值军人专政，为维持大学的发展，曾一度兼任河南教育厅厅长，为发展河南大学不遗余力”^[7]。任初先生在担任河南大学校长期间，参与制定了“解决安阳殷墟发掘办法”，主持了河南与广州两地中山大学互换教授的工作并广为延揽师资人才。1930年，任初先生邀请自己在武昌高等师范学院时的学生、留日归来的数学家王福春到河南大学任教。此外，任初先生还建议各系四年级学生写毕业论文，擅长书法的任初先生还指导和组织学生们成立了书画研究会等，这些在当时的高校中实不多见。

任初先生的执教生涯中，在广州中山大学的经历最为复杂，前后三次且几经辗转。

第一次为1926年8月国立广东大

学改名国立中山大学之时，校方向国内外聘请著名学者来校任教。任初先生受聘成为该校数学天文系主任，并执教至1928年第一学期末。关于任初先生承担的课程、课时，《中山大学校史》里有这样的记载：数学天文系一年级的进级代数，每周4课时；数学天文系二年级、三年级的必修课和化学系二年级选修课数论，每周2学时；数学天文学三年级的必修课微积分，每周6学时；物理系二年级、化学系二年级和矿物地质系二年级的必修课微积分，每周3学时。上列共四个学系六个年级讲授三门课程，每周课堂教学达到15课时之多^[8]。若没有高深学问，是很难做到的。这期间，也是任初先生学术成果的又一个勃发期。仅在1928年半年的时间里，任初先生就在当时的学术刊物《自然科学》上发表了论文《音理余论》、《一》、《错数》、《Monge方程式之扩张》等文章。

1936年，任初先生二次受聘于广州中山大学，成为不分系教授（不久为工学院教授），分别为理学院、工学院的学生开设专业课。为理学院数学天文系新开选修课程连续群论，并开设必修课程微分几何；为工学院化学工程系、电气工程系讲授数学。除此之外，任初先生还常常“不务正业”，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学生讲授骈文研究。任初先生极爱骈文，教授学生骈文也成为他的一大乐趣，常对人言道：“系主任可以不当，骈文却不可不教”。

可惜，这段快乐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1938年10月，日军入侵，广州沦陷，任初先生不得已为避难移居香港。

1940年8月，中山大学迁回粤北山区坪石办学。先生穿越封锁线回校，任理学院院长兼数天系主任。时虽戎马倥偬，但先生弦歌未辍，坚持职守。一方面，要协助新任校长张云处理繁务。张云是先生于河南大学任校长时

的学生，年轻有为，他到任后，就衷心请先生任校长室秘书长，为了扶掖新生，先生慨然屈尊应聘，忙得不亦乐乎！张云在回忆起这段与恩师共事的经历时说：“我在坪石掌理中大时，黄师慨然降尊，屈就记室，事无大小，莫不躬亲，职权所关，必谦虚研讨，减轻了我对事务的关怀，而增加了我奋进的活力。尝对人言：‘青出于蓝，我当辅之，以成大业。’诚挚热烈的心情，令我感激的无可言状，惟有尽着弟子敬师之礼，事之如父而已。”^[9]眷眷师长情，拳拳门生意，令人感佩！除此之外，任初先生还要授课，除数学课程外，每周还要为理学院的新生上一次文学基础课。他说：“新生如初生的婴儿，老师需要像保姆一样，予以悉心保护。”与此同时，任初先生又欣然接受文学院学生们的环请，到距离坪石校本部十余里路的清底洞文学院，为学生们讲骈体文和文字学，据当年在坪石就读文科，今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的林莲仙教授在《缅怀黄任初师》一文中回忆说：“任师每星期必到文学院两次，给我们讲新课‘骈文研究’和文字学，以一位理学院院长、数学天文系主任兼校长室秘书长，再兼文学院的课程，在我一生所接触的大专院校教师中，除任师外未见有第二位。”^[10]但对于任初先生而言，“此义务功课，较诸授薪而为者，吾兴趣更浓。”此外，据1943年在坪石铁岭读中国语言文学系三年级的学生何其逊回忆，任初先生读文章尤其是读骈文很有特点，“一个劲儿地在摇头晃脑、拖声呶气的吟咏汪中的《吊黄祖文》。而且还伴随着抑扬顿挫、悠扬悦耳的潮州口音，以手击节，用脚打板，连两眼也眯缝起来，脑袋也在不断地划着圆圈。”时间一长，同学们都习惯了他的教法，心生钦佩，对他那潮州哼声也感到亲切悦耳。“上黄老师的骈文课，真是如坐春风，如饮醇酒，无时无刻不享受着文学艺术的熏陶”^[11]。



张云（1897-1958），法国里昂大学天文学博士。1928年后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授、数学天文系主任、教务长、校长等职。他曾是黄际遇任河南大学校长时的学生

1945年1月，日寇又犯坪石，学校通告紧急疏散，由坪石迁往仁化、梅县，往西走连县，学校师生分散三地。先生虽避地湘西，又与临武山中诸生讲《十三经》，精力充沛，声震屋宇，日夜不息，毫无倦意。先生的高风亮节博得全校师生一致之高评！先生教过的中山大学弟子很多，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曾任中大校长的张云都是他的学生。

骈积之劳，日知成书^[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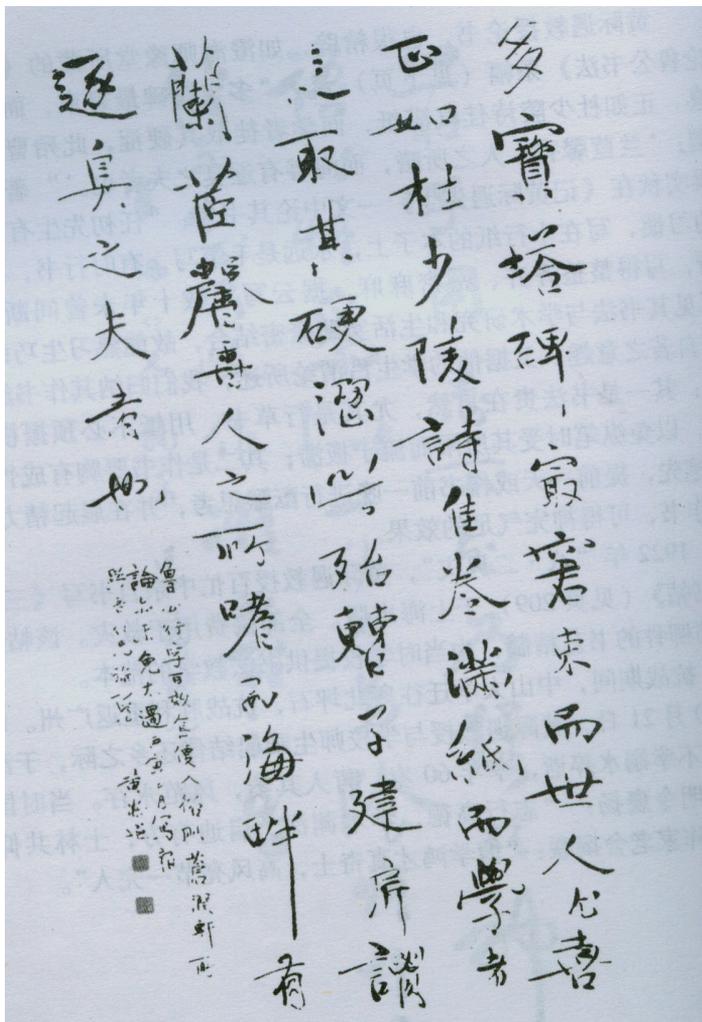
开篇曾言及先生日记，目前留存下来的共有四部四十三册：其在青岛所记者，曰《万年山中日记》，曰《不其山馆日记》。广州所记者，曰《因树山馆日记》。在临武所记者，曰《山林之牢日记》。日记的命名皆与当时先生所居之处有关，或直接采用其名，或借以相关典故。如《万年山中日记·第二十册序》：“万年山者，国立山东大学旧国立青岛大学之所在也。地居

青岛之西南，当日德人聚兵于此，筑营其间。三间环山，一面当海，东海雄风，隐然具备。今则修文偃武，弦歌礼乐，三年于兹。”而《山林之牢日记》因先生当时身在临武，取韩愈“君飘临武，山林之牢”句乃作集名。

对于坚持写日记的原因，任初先生曾在其《万年山中日记·第八册序》中专门述之：

日记者，一个人之流水簿也，子张书诸绅，志之不敢忘也。颜渊退而省其私，省其所私得也。然则私门著述之最凌乱无章者，莫日记也。然记述中之最可自信，而非有所为而为者，又莫日记若也。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有得即书，不假排比，此或天下之至愚者，方肯为之。顾成名与成举，不全相同，学问之事，又非尽出诸天下之至知者，爱迪生之成功也，自云得之灵感者什之一二，得之血汗者什之七八，夫知而不行，与不知等不实行者不为真知，行之不券，时有新知。是故以际遇之顽鲁，望道而未之见，而仍怀此以自壮也。况所治者乃极抽象，而论证极严之学，机稍纵而即逝，思稍钝而即塞，弩马十驾，辄昧前程。愚公移山，失之眉睫。个中甘苦，惟于青灯有味时聊自知之，然此境已不过日月至焉而已矣。山居无人事之苦，往往经月不入市尘，而所得者仅止于此，知难而不敢退，又未始非此茕茕相依之日记，有以策予也，是用作序，敢告执鞲。壬申大雪，任初记。

在任初先生看来，日记具有及时记录以备遗忘、铢积寸累以进学识、总结经验以明得失的作用，尽管先生曾打趣自己所记为“盗窃文史之末，因循书数之间”，但仅其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细腻有恒之精神，就着实令人叹服，更何况日记内容实堪称博大精深——数学、文学、历史、书信、对联、诗文、棋谱、音韵、训诂等多种研究心得无一不包。



任初先生精碑学，其书法健朗俊逸，笔致精到，看似随意处实则法度谨严。此为任初先生的一幅书法作品：“多宝塔碑最窅束，而世人尤喜，正如杜少陵诗佳气满纸，而学者徒取其硬涩，此殆曾子建所谓：‘兰苣馨香，人之所嗜，而海畔有逐臭之夫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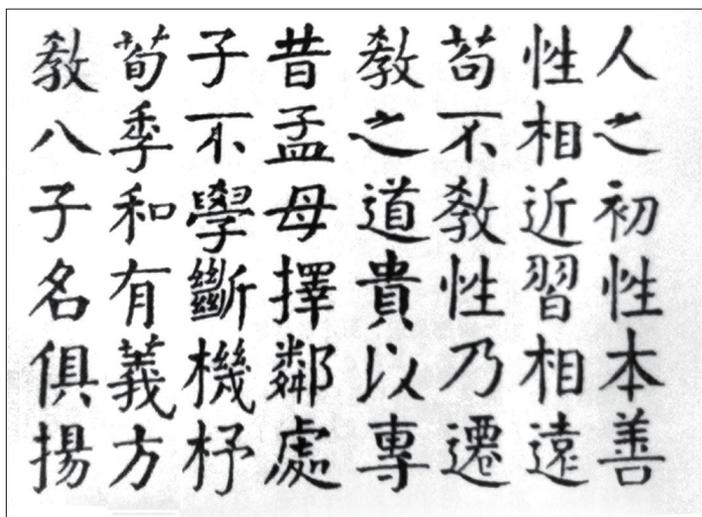


任初先生的一幅篆书对联：“日思误书更是一适，今叙篆文以究万原。”联侧题款：“上联为邢子才语校劝学所有事也，因撰许叔重说文叙语成联书之。畹盒主人黄际遇。”

邢子才，即邢邵，字子才。北魏河间人。文学家，记忆力强，十岁能属文，五天读完《汉书》，撰有文集三十卷。

许慎，字叔重，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著有《说文解字》十五卷，是我国第一部说解文字原始结构及字源的专著。

此联为任初先生集邢邵、许慎二人成句，以表达其对文字、书法研究的意趣。现藏于汕头市博物馆。



1922年“八二风灾”时，任初先生亲自书写的《三字经楷书帖》（局部）

先生还总结出日记“三得”(《万年山中日记·第七册序》):

循日读书, 过境遂忘, 矧迫衰年, 尤苦罔沕(夹注:《招隐士》“罔乎沕”, 王逸曰:“精气失也”)。自为此记, 日知所无。羨鱼结网, 亡羊补牢, 篋积之劳, 亦收寸进。其得一也。学海汪洋, 师友睽绝, 私门讲学, 聚书已难。幸近高密, 时沐流风(夹注:高密去青岛百三十里, 康成故里也), 叨接兰台(夹注:汉藏秘书之官观), 常供秘笈。披所闻见, 实其简编, 解彼嘉言, 攘为己出。虽不敢久假不归, 然亦恶知其非有。其得二也。先生述之, 门人记之, 传习有录, 日知成书, 登此鱣堂(夹注:见《后汉书·杨震传》), 益渐俭腹。用以札牒, 以存爬梳。虽写定之难言, 已响濡之有自, 留之他日, 或以覆瓿; 遗诸子弟, 聊愈兼金, 鉴覆辙与前车, 认识途于老马, 其得三也。

此三得可谓先生笔耕不辍的功力, 对于当下时代, 也不无警醒之意义。

先生的日记诚然是座学问的宝库, 但更是所知识的迷宫。日记内容皆用毛笔以文言写就, 夹杂大量铺陈用典的骈文以及诗词掌故, 且不加标点, 更有英、日、德等诸国文字以及大量的数学推理公式穿插其间。再加上先生书法兼学百家, 可以想见日记里行、草、篆、隶犖犖大观的场面。先生日记六十年来未能得以刊行于世, 以至先生之学久不为世人所知, 此为一重要原因。

据有幸读过《万年山中日记》的杨方笙先生介绍, “日记统用‘青岛华昌大印’连史纸 16 开乌丝栏笺, 毛笔书写, 单面折页, 每面十行, 行楷兼用, 斐然可观。”^[13] 因先生治学往往纵横贯通, 喜做骈文而兼喜楹联, 因此, “日记中不仅选录大量前人联语, 自己还撰做了不少题赠对、格言对、集句对, 尤喜能充分体现汉字精巧特点的灯谜、酒令等。” 从中不难想见日记内容的博杂。

兹录先生于 1935 年在山东大学任教时的日记一则, 与诸君共飨:

1933 年 5 月 3 日, 曰:

“学术史最不易作, 非淹贯各科, 兼有史才者不办。庄周《天下篇》和大史公极富学术价值的日记《论六家要旨》, 综论诸家学术思想, 为其滥觞。班固《艺文志》, 方具雏形。于今二千余年, 尚未有完备之著作也。《宋元学案》为理性思想史, 《畴人传》为天算家略传, 《佩文斋书画谱》为艺术稗乘, 未足为学术史也。近人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专传朴学, 偏重宗派, 于学术思想, 尚少汇通, 然形式粗具, 实受欧史之暗示。梁公所著, 才气横溢, 取法极正, 惜体大而思未精, 既怀传世之心, 又急售世之利, 是其所短。比年学风走速成之路, 陈半熟之品, 凡百皆然, 梁公未能免于风气也。”

此为任初先生读罢 1929 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的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后写下的感受。先生向来主张做学问要“勾通文理之邮”(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不分文理”, 讲究“多学科交叉”), 先生以历代典籍为例, 强调学术史“非有淹贯各科”并“兼有史才者”所不易做, 即使对于道德文章兼备的梁任公也以此批评之。先生这样要求别人, 同时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致力实学, 莫逐虚名”贯穿于先生的一生, 其藏于篋中, 没于日记的著述远远多于其付梓之作。

可以说, 几乎没有人能够读懂这些日记里的所有内容, 但从另一方面又可以说, 几乎每个人都能够从这些日记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东西。由此, 以文及人, 若要了解先生, 读懂先生, 想来也绝非一人之力, 一日之功。

凤翥龙翔, 银钩铁划

任先生书法以颜体为本, 兼融诸

家之长, 楷、行、草、隶、篆并工, 造诣甚高。

在日本留学期间, 先生书法主学何绍基, 后来到武汉大学任教则专临《郑文公碑》及《张黑女碑》, 在河南大学时又学颜鲁公及钱南园等法帖, 皆得其神。据曾侍奉先生临池的东床快婿钟集先生回忆, “先生原学颜鲁公, 后兼学百家, 造诣甚高。在坪石时, 师生慕名求墨宝者极多, 先生通常多写行书条幅, 亦有中堂、对联、横披、扇面、匾额等, 有时一日多至 20 余帧, 落款皆有所不同。写大字匾额, 不须钩边。先生撰《罗文干墓志铭》后, 亲自寸楷书写, 从早晨七时许开始, 一直写到午后一时, 一气呵成, 书法超绝, 从纸背见笔力均匀进纸, 洵为艺术珍品。”^[14]

先生曾谈学书之法云, “写字以唐字为底, 横平正直缓缓写”, “欲求用世则沿明而下, 取法近贤, 以博其用; 欲求自得则溯晋而上, 尚友古人, 以究其蕴。”^[15] 现藏于澄海师豫堂的《黄际遇论鲁公书法》条幅云: “多宝塔碑最窘束, 而世人尤喜, 正如杜少陵诗佳气满纸, 而学者徒取其硬涩, 此殆曹子建所谓‘兰茝馨香, 人之所嗜, 而海畔有逐臭之夫者也’”, 可见先生对于历代书法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据说, 先生有一癖好叫做“宿墨不可用”, 每次写作都要现磨鲜墨才好, 且写字绝不能临阵随意一番, 一定要在早晨精力充沛时胸有成竹而写, 所谓胸有成竹就是要在前一天或晚上要考虑好怎样下笔, 怎样构思。正如饶宗颐先生对任初先生的评价——“善书, 顾不轻于下笔。”^[16]

有一次, 恰好钟集及其小友吕渭纶侍奉先生左右, 先生说明晨要写幅字送还人家, 钟集和吕渭纶一大早就起来磨墨, 两个人的效率很高, 不一会儿就磨好了, 钟集还捎带手把待写的纸小心折好, 以方便书写。不一会儿, 先生散步回来正准备挥毫, 但见

纸张有折痕便说道：“这张纸不用了，写字的纸不可折，呆板不得。再者，依照折痕写字丧失书法贵在自然的精神，尤其行草书，大可不必预设框架，反为所限而流于艰涩呆滞，有失本真，这种做法算不得是个真正的书法家。”可怜见的，钟集只好将纸张弃置不用。平日里先生写字也从不随便，即便是上课写板书亦是如此。尤其是给中文系的学生上课时，其板书一律用篆文书写，称：“中文系高年级的学生嘛，应该学！”^[11]任初先生板书篆书既快且好，被学生赞为“银钩铁划”。

在中山大学时，每每有人登门求字，赞先生为中山大学“一枝笔”。对此任初先生常答道：“中山大学之内有‘枝半笔’，我只能算是‘半枝笔’，真正的一枝笔是侯过教授（侯教授时为广州中山大学农学院林学系系主任、教授——作者注）”^[17]。既有自谦之义亦有自诩之辞，这也是先生自信之处吧。

1922年“八二风灾”，任初先生亲自书写《三字经楷书帖》并于上海出版，该帖体现了颜筋柳骨的书法精髓，为当时学校提供书法教学的范本。任初先生将所得稿费全部捐出用于救灾。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18]

琴棋书画，号为四雅，先生精于其二；骑术技击，可谓两难，先生承袭一身。但就是这样一个“动静皆宜”之人却有一致命软肋——不会游泳。

任初先生虽生于海滨，却一直视水为畏途，此中原因颇令人费解。据说先生早年间曾由著名相士看流年，云：“晚岁有水厄，能救尔者尔子也。”当时先生权当戏言，未尝挂怀。后岁，先生研读周易有年，曾自占一卦，亦有将厄于水难之兆，与相士之言竟然无二，自此暗暗吃惊，乃至有些耿耿



现代史上中国数学博士第一人胡明复(1891-1927)

于怀了。一次与张作人教授谈及此事，张听罢哈哈大笑，适逢先生四子家枢中学结业，奉侍严尊在侧，张教授见其健壮结实，风华正茂，就说道：“那就延请名师，训练家枢游泳吧！”果然，家枢转读于坪石中大附中高中部后，每天下午放学，必往北江训练游泳，日日如是。先生也常至岸畔，笑迎四子游归。相士之言固不足取信，而自测之兆与之暗合似也不能为凭，然任初先生一生的重大变故的确与水有着直接关系。

1925年11月，先生由上海乘飞鲸号轮船返乡，船行至福建诏安时触礁。当一船人眼看着船随时可能沉没而迫切盼望救援时，屋漏偏逢连夜雨，又遇见一群海盗趁火打劫。先生十多年的日记、文稿以及随身的财物不是被海浪卷走就是遭海盗洗劫，仅只身脱险。后来先生回忆时留下这样的记载：“乙丑，飞鲸沉舟之难，急时自祷于天，谓幸而免，归葬父事毕，不再行役。”（《复姚秋园书》）尽管先生并不迷信，但危急之时仍不免“自祷于天”，并将遇难的原因归咎于其“久负家山，食言誓墓”，于是发誓如果

此次得以幸免，给父亲扫墓后将不再远行，想来这也应是其第二年即受聘于广州国立中山大学的原因之一。

但计划不如变化，1928年，经不住时任河南省主席的冯玉祥将军再三诚挚邀请，任初先生决定北上开封，担任国立开封中山大学校务主任兼数学系教授，并于第二年5月被任命为河南中山大学校长兼河南省教育厅厅长。此后，因时局动荡，任初先生又几经辗转播迁。虽亦有涉水远行，所幸安全无虞。

1945年抗战胜利，散播四处的中山大学师生陆续迁返广州。时为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主任的任初先生也携四子家枢乘坐校方租用的大船与部分教师及家眷同返。

舟楫一路沿北江而下，正值秋高气爽，加之心情舒畅，先生早已将占卜之言淡忘，而是一心一意辅导家枢学习数学，希望其到广州后能顺利考取中大数学系。自登船之日，每天晨起，必出题若干令其演算，待至准确无误，方由家枢搀扶至船尾出恭，几乎形成习惯。谁料到了10月21日这天，船行至清远白庙，风云突变，水急浪湍。巧的是，那一日先生为家枢增加了演算题目，家枢作业尚未完成，先生不想打扰，遂独自一人赴船尾，竟不幸落水。

家枢闻声，衣服也来不及解脱，急入江中抢救。虽抓住任初先生，但当时风高浪大，且身有衣物，始终无法返回坐船，而家枢已经疲力尽。正当一筹莫展之际，有一大船迎面驶来，教务长邓植仪同教授们向该船水手求援，并愿酬以重金。谁料答道：“我船祖训，从不落水救人，因救一必失一，请谅请谅！”一线希望化为尘埃。此时，后面学生乘坐的帆船赶到，六百多位同学纷纷下水寻觅搜索，几十分钟过去，杳无踪影。最后，有一渔船正在撒网捕鱼，经请求，愿施义举，终于，先生和四子家枢被一同

救起。校医立即抢救，家枢很快苏醒过来，但任初先生却因肺部积水过多，终于与世永别！^[19]

任初先生游历人间六十载，临水而生又随水而逝，文理兼通、中西学贯，然生性淡泊，不求闻达。致力教育垂四十年，万里迢递，四海桃李。虽时局艰难期间，亦诲人不倦，讲诵不辍。胜利凯旋之日，却不幸没水罹难。正值学术壮年不幸殒命，怎不令人嗟叹。时国民政府明令褒扬，称其“志行高洁，学术渊深。启迪有方，士林共仰”。任初先生是我国有史以来由政府明令褒扬的第二位数学家（第一位为胡明复先生，系中国人攻读数学专业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人，曾参与创建了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以及最早的综合性科学杂志——《科学》，1927年6月12日在无锡溺水身亡，年仅36岁）。

任初先生追悼会那天，中央教育部特派要员前来执事。各界名士如于右任、陈立夫、戴笠、柳亚子、胡适、梁实秋、老舍等80多人均致送挽词花圈。受业老舍挽曰：“博学鸿才真奇士，高风亮节一完人”；硕儒姚梓芳撰《澄海黄任初教授墓碑》有言：“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斯二语惟君足以当之。”

诚哉斯言！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山东大学数学院院长刘建亚教授的大力支持，四川大学数学学院罗懋康教授多次给予了细致的指点，潮汕文化研究中心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1. 唐刘长卿《湘中忆归》诗有“迢递万里帆，飘摇一行客”，宋元绛《贺王禹玉》诗有“星辰影落三阶下，桃李阴成四海间”。
2. 陈景熙：《黄际遇先生年谱简编》，陈景熙、林伦伦主编《黄际遇先生纪念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3-94页。
3. 宣统三年五月初九，《唐景崇等为请照章录用廷试游学毕业生事奏折》，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宣统二年归国留学生史料续编》
4. 详见《黄际遇日记（节本）》，1932年12月14日；1933年3月9日，3月21日，11月17日，11月24日。
5. 张友余：《黄际遇传》，陈景熙、林伦伦主编《黄际遇先生纪念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
6. 《黄任初教授未克南来》，《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29年1月18日。
7. 《河南大学校史》2002年9月第1版。
8. 黄义祥：《三进中大任教的黄际遇教授》，《中山大学校报》（校友专刊），2000年7月上旬，（增）第36号。
9. 张云：《黄任初先生文钞》序，广州国立中山大学1949年版，第1页。
10. 林莲仙：《缅怀黄任初师》，《汕头文史·潮汕教育述往》1991年第9辑，第172-179页。
11. 何其逊：《岭南才子亦名师——怀念黄际遇教授》，《中山大学校报》1984年11月10日。
12. 《万年山中日记》第七册小序。
13. 杨方笙：《黄际遇和他的〈万年山中日记〉——纪念先生诞生110周年，逝世50周年》，载饶宗颐主编：《潮学研究》第四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95页。
14. 钟集：《记黄际遇先生》，陈景熙、林伦伦主编《黄际遇先生纪念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页。
15. 《万年山中日记》1933年5月2日。
16. 饶宗颐《黄际遇教授传》，载《暹罗澄海同乡会成立周年纪念刊》，1949年泰国曼谷，第35页。
17. 吕渭纶：《怀念黄际遇先生》，《汕头史志》1995年第3期，第10—12页。
18. 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语“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发人“神化为岳，魂归于川”之联想，后句入正文。
19. 博学鸿才真奇士，高风亮节一完人——黄际遇教授遇难记，1988年10月黄际遇先生四子黄家枢先生口述，陈训先整理，《岭南文史》2010年第2期。